

论秦牧散文中的“尖端事物”

——兼论散文创作的选材

李星奎, 文 名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正确选用题材是散文创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做得怎样,直接影响到作者写作意图的表达,影响着散文的质量。秦牧的散文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值得人们好好学习。

关键词:秦牧散文;题材选用;经验总结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4-0078-07

在中国广阔的散文天地里,曾经闪耀着一颗璀璨的明星。被称为“中国当代三大散文家”之一的秦牧先生,曾经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散文,“给文坛创立了一种崭新的风格”[1](64页)。

秦牧散文的“崭新的风格”,主要体现在深刻的立意、巧妙的构思、精心的选材和灵活的表达等方面。特别是在散文的选材方面,秦牧更是强调,散文的作者“必须去选择‘尖端状态’,突出的,具有较大意义的事物,加以发挥”[2](243页)。因为这种处于“尖端状态”的事物,不仅“可以使散文给人以强烈感”,而且能“使蕴藏于其中的思想,让阶级立场相同或接近的人产生共鸣”[2](243页)。

秦牧所说的“尖端状态”的“事物”,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典型材料。这种典型材料,既“是具体的,个别的,富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同时又“最能体现

同一类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普遍意义”。它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具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3](50页)。具体地说,散文中的“尖端事物”,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 同类事物的典型代表,具有同类事物的本质特征

在散文创作中,“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刘勰说:“事信而不诞。”[4](30页)就是说,一个事物,只有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代表了同类事物的共同特征、体现了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才是典型的,才有写入文章的必要。秦牧有一篇议论散文,叫做《鬣狗的风格》。其间的“鬣狗”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事物。从“鬣狗”这一“尖端事物”身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帮”的帮凶们阴险、狡诈、狠毒、灵魂丑恶、行为卑鄙、嗜血如命的反动本质。

2. 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典型的事物都有自己鲜明、独特的个性。任何

收稿日期:2001-10-19

作者简介:李星奎(1945—),男,四川省资中县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广东秦牧创作研究会常务理事;

文名(1979—),女,四川省营山县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1998级学生。

事物的存在,都跟周围的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同类事物的共性,同时又以其独特的个性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人们在论述小说创作的典型化时,往往都要引用恩格斯《致敏·考茨基》中的一段话:“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5](453页)其实岂止是小说创作,散文创作又何尝不是这样?秦牧之所以强调散文要把“尖端事物”作为题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6](409页)。毛泽东也指出:矛盾的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7](294页)。通过散文中的“尖端事物”的个性,不仅可以表现事物的共同本质,同时也可以看到它与其他事物的区别,并从中折射出时代的特点。秦牧的《赌赛》通过对用自行车载客的农民和一口气跑三里多路、把四五百斤重的豆饼担回家的大力士的描写,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一种“劳动者创造世界的豪迈气魄”及创造世界的不同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当年“大跃进”的时代特色。而《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则是用“含泪的幽默”,“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8](112页)。文中那个曾经摔掉秦牧的眼镜,叫秦牧做马让她骑一骑的女孩,也许曾经拥有天真烂漫、纯朴善良、尊敬老人的优良品质。但是,在“四人帮”的毒害下,她却变成被扭曲了灵魂的少年儿童的代表。从这个小女孩身上,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四人帮”对青少年一代的摧残、毒害,同时也可以看到秦牧“对于一个世代的儿童,在那年头所受到的恶劣影响的感叹和忧虑”[2](555页)。秦牧写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人们通过那个曾经想把他当马骑的小姑娘去认识“四人帮”的本质,认识当时那个被扰乱了的社会。秦牧希望和小姑娘类似的一代,以及“曾经呼吸过那血腥岁月的毒尘的人,能够认识那种毒尘的来源和性质,自觉清除它们”[2](559页),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秦牧那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人品。

3. 生动形象,富于表现力

散文是文学,文学讲究生动形象。散文的艺术魅力,既与其精美的艺术构思、诗一样的语言和迷人的意境紧紧相连,更与其题材的典型生动密不可分。杨朔写散文,为什么要在动笔时,先“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文字”[9](201页)?就因为他明

白,散文的题材,不应是原始生活的照抄照搬,而应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0](818页)。散文题材的这种典型性,集中体现在题材本身的生动性和形象性上。题材的生动性能使人为之感动,题材的形象性能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并产生一种“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4](《神思》)的感觉。散文不是政治教科书,没有必要像政治家那样一条二款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恩格斯主张让作者的倾向“从场面和情节本身流露出来”[5](454页),毛泽东更是“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10](826页)。毛泽东还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11](1265页),体现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2](500页)。文学作品的这种生动的、鲜明的、新鲜活泼的民族风格,在秦牧的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们经常说齐白石画的虾是很美的,但究竟如何个美法,却不得而知。秦牧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农妇到他家去倒人尿肥,一进门来,看见他家客厅墙上挂着齐白石的水墨虾画,连担子也忘了卸下肩来。她一面欣赏那幅虾画,一面啧啧连声地赞叹:“真像呀,就和活的一模一样。”这个故事是秦牧《虾趣》中的一个题材。它不仅充分体现了散文中典型题材那种生动形象的特点,而且把“齐白石画的虾是很美的”这一抽象的判断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表现出秦牧散文中的“尖端事物”的独特魅力。又如,人们一提到“菱角”二字,就会联想到曾经吃过的菱角的样子,联想起用菱角壳做的玩具和小时候唱过的“菱角儿,两头尖”的儿歌,就会误认为菱角只有两个角。秦牧结合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菱角不仅有二个角的,而且还有三个角的、四个角的,甚至五个角的,同时还有无角的和几个菱角一个角的。通过对这些典型事物的描写,秦牧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对于任何一个事物,都不能孤立地看它,应该想到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为“复杂性、多样性总是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的。

总的说来,秦牧散文中的“尖端事物”,不仅具备了同类事物的共性,而且也显示出该事物的独特

个性。从这种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又表现出该事物既有生动形象性,又富于表现力和说服力的特点。

一

周立波在谈散文的题材时曾经说过:“举凡国际国内的大事,社会家庭的细微,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13]这是就整个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而言的。但就某一篇具体的散文来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什么都写进去。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这要根据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章的主题来决定。秦牧在选用“尖端事物”作为散文的题材时,除了周立波所说的之外,更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好的事物与坏的事物并举,大的事物和小的事物对照,先进的典型与落后的典型结对而出,伟大的事物与平凡的事物共存并处,真、善、美在同假、恶、丑的比较中存在,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统一。

1. 好与坏的并举

在秦牧的散文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鲁迅等革命作家如何在为中国的革命摇旗呐喊,而且也能看到“四人帮”的爪牙们如何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朝着革命作家狂吠;不仅能看到像朱德、彭德怀、贺龙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共产党员人如何在“百折不挠地为人民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14](42页),而且也能看到“四人帮”一伙如何将革命前辈迫害致死的滔天罪行;不仅可以看到渔家孩子的“勤劳、整洁、处事认真”[15](587页),而且也可以看到喜欢把别人当马骑的女孩的阴狠、凶恶与可悲……正是这些美好的事物与丑恶的事物成对地出现,才使美好的事物更加美好,丑恶的事物更加丑恶。同时散文的教育功能在此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2. 大与小的结合

散文中的“尖端事物”,不应该是朝着一个方向一边倒。比如,要好就都好,要坏就都坏,要先进就都先进,要落后就都落后。如果题材一边倒,不仅会违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且会落入“四人帮”“三突出”创作方法的圈套,背离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秦牧散文中的“尖端事物”,有许多都是事物中的“大”者,也有不少是事物

中的“小”者。这种“大”与“小”的结合,正好体现了事物间的辩证统一,表现出秦牧散文在选材上的另一特点。极写事物之大(含长与巧)者如:身挑四五百斤还能走上一段路的大力士,五斤多重、形同西瓜的茄子,像海鳗一样蜿蜒扭曲、长达好几尺的蛇豆,每只重达三十多斤、几只凑在一起其鸣叫声即可传到一两里之外的狮头鹅,年龄已经一百四十多岁、还获得射击比赛冠军的老寿星,以及只看看水纹就可以到水中抓鱼和鳖的抓鱼能手和捉鳖人,只要把耳朵贴在船舱里就能辨别水中的鱼种的老渔民。极写事物之小者如:人们司空见惯的一撮食盐,从不惹人重视的一只蚂蚁、一只蜜蜂、一粒沙子、一点火花、一滴水珠,等等。大小事物结合在一起,则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不同事物的不同特点和本质。

3. 先进与落后的对照

在如何对待“暴露”与“歌颂”的问题上,毛泽东历来主张文学作品应该全力歌颂英雄、赞扬先进,描写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事物。虽然有时“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10](817页)。鲁迅也说:“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16](3页)。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能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才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10](817页)。

秦牧是一个善于用散文来歌颂先进人物、先进思想的作家。人们从《摸鱼能手》中的亿泉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普通农民身上的共产主义品质”。而从《琴纳医生的凯歌》一文中的琴纳身上我们更能看到一个外国医务工作者是如何为人类的利益而奋力拼搏的。琴纳的思想品格,对于今天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员来说,尤其应该好好学习和发扬光大。

在秦牧的散文中,也不乏批评落后东西的题材。例如《大象哀歌》、《南国鸟市》、《大自然敲响了警钟》等作品,就是针对某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不惜肆意捕禽猎兽、滥砍乱伐林木、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的野蛮行径进行控诉和批判的。不过,这种控诉和批判、揭露和声讨,完全是为歌颂先进作陪衬的。把先进和落后进行对照,从而更加突出先进,让先进永远占领散文园地,这就是秦牧揭露和批判落后的目

的。

4. 伟大与平凡共存

陈衡先生在谈秦牧散文的选材时指出：“秦牧不仅注意描写‘尖端状态’的事物，而且以敏锐的目光，精心选择大量有启示作用的平凡生活事件和现象，显露平凡的伟大，揭示各种事物的社会意义和实际价值，从‘真’中找到善、美的意蕴。”[8](106页)陈衡的这段话，准确而深刻地概括了秦牧散文在选材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伟大与平凡共存。伟大与平凡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尖端事物”的典型性，不仅存在于伟大的事物中，而且也存在于平凡的小事里。

在秦牧的散文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充满血雨腥风的中国革命史、汹涌澎湃的世界革命等掀天大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鲁迅、郭沫若等伟大人物，而且也可以看到一包茶叶、一杯黄土、一撮盐巴、一书籍这样的小事物。生活中的这些伟大与平凡的事物，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揭示了某个方面的真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秦牧把它们作为散文的题材，意义十分深远。不过，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秦牧散文中的这些代表伟大与平凡的“尖端事物”，经常都是在同一篇作品中同时出现。比如《古战场春晓》中，既有三元里人民为保卫家乡、保卫祖国而同英军浴血奋战的伟大业绩，也有对敌人跪在地上、举手求饶的辛辣讽刺。这种伟大与平凡的高度融合，正义与邪恶的相互映衬，更加突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题材本身包含的深刻意义。1857年5月22日，恩格斯在描述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英军的业绩时说：“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17](21—22页)。恩格斯的预言，正好是秦牧将三元里抗英这一“尖端事物”作为散文题材的原因之所在。

5. 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比较

毛泽东指出：“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18](484页)秦牧在选择“尖端事物”作为散文的题材时，还十分注意将真、善、美的事物与假、恶、丑的事物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挖掘事物的本质意义。

在生活中，真、善、美的东西能陶冶人的情操，愉悦人的心情，激发人的斗志，鼓舞人们前进；假、恶、丑的东西则使人反感，令人憎恶，让人颓废，消磨人的意志。秦牧将两方面的“尖端事物”放在散文中进行比较，让人们在比较中认清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哪些东西该吸收，哪些东西该遗弃，从而自觉地维护真理，批判谬误。

在文学创作中，真、善、美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秦牧曾在《优美》一文中对三者进行过这样的阐述：“真，表示它是合于生活的实际的；善，表示它是阐发崇高的思想和宣扬宝贵的伦理的；美，表示它是通过艺术手段让人读后获得美感的。”秦牧又进一步指出：“只有在具有真实感的基础上，事物的美感才能为人们所接受。”这就说明，在真、善、美的统一体中，真是基础，是前提。没有真作基础，其它两项也就无从说起了。因为“真”中本来就蕴藏着“善”和“美”，包含了生活的本质，所以在选择散文的题材时，首先应该考虑题材的真实性。

秦牧写入散文中的“尖端事物”，都是符合“真”的要求的。这些“尖端事物”，不管是重大的题材，还是凡人小事；不管是歌颂的对象，还是批判的靶子，都是确有其人其事其物的。其间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乃至每一个数据，都是准确无误的，有案可稽的。特别是秦牧的两本文艺论著（《艺海拾贝》、《语林采英》）中的95篇作品，每篇都以具体的事实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某一生活哲理或某一文艺创作观点。如果所写事实不真实，其阐述的哲理和观点又怎么能使人信服，并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呢？所以，秦牧指出：文学创作“越具体的所在，就要求越高度的细节上的真实”。这种充满细节真实的作品，“只要它所体现的思想是能够使人产生共鸣的，它们往往有很大的艺术力量”[19](96页)。

真、善、美的对立面是假、恶、丑。生活中的假、恶、丑事物，由于它们违背人们的意愿，同真理背道而驰，所以常常受到人们的批判和鞭挞。但是，如果把这类事物中的“尖端事物”写进散文，将其与真、善、美的“尖端事物”进行比较，就会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美好事物的可贵，从而更珍爱之；认识丑恶事物的可憎，从而更痛恨之。《在虚假的事象面前》就是一篇将真、善、美与假、恶、丑进行鲜明对比的优秀散文。文中的德国医学教授贝林格尔因为缺乏化石

知识而偏要去从事化石研究,结果遭人暗算,被人欺骗,最后在穷愁悲愤中默默死去;达尔文是一位大科学家,当别人设了一个骗局来欺骗他的时候,他却一眼识穿了骗局,使对方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秦牧把这一真一假、一正一反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让人们在比较中悟出这样的道理:对待一切虚假的东西,首先要保持清醒、冷静的态度,并具备相应的知识,然后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揭穿其真相,把其丑恶的本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骗子就不再敢去骗人了。

6. 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统一

评论家们在评论秦牧散文的时候,多用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概括其特点,这是很对的。其实,这些特点也贯穿于他的散文选材之中,形成了他选用“尖端事物”作为散文题材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同真、善、美之间,本来就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思想性与善密不可分,知识性同真紧密相连,趣味性本身就是一种美。所以,散文中的“尖端事物”,只要拥有了真、善、美的内涵,同样也就具备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不过,单就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三者来看,思想性应该是主要的,知识性其次,趣味性更次之。所以,散文在选用“尖端事物”时,首先应考虑它能告诉人们什么思想、什么观点,其次应考虑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再次应考虑它能否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从中获得美的享受。一个“尖端事物”,只有同时具备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才能作为散文的最佳题材。用这样的题材写的散文,才是最好的散文。

以上所谈“趣味性”,是就“尖端事物”本身而言的。但在具体的行文中,还有一个表现技巧的问题。散文的表现技巧(或谓表现手段)具有广泛的涵义。它包含“语言的运用”(这是主要的)、“意笔和工笔交错运用”、“节骨眼上的精心刻画”、“关键之处的感情奔注”等诸多方面[2](244页)。一篇优秀的散文,应该是思想、生活知识和艺术技巧的完美结合体。所以秦牧希望散文创作的这三个要素“大大地发展,并且水乳交融地配合”[20](75页)。

秦牧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社稷坛抒情》既写了被放逐诗人屈原在流亡途中的凄凉悲伤,又写了古代科学家们对自然之谜的苦苦探索;既写了为了土地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又写了为争夺地盘而互相残杀的藩镇割据;既写了国外

华侨对祖国的思念,又写了作者盼望祖国完全统一的热切心情。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音乐、历史、古人、今人、阴阳五行、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每个事件都包含深刻的思想意义,每个故事都使人获得知识的享受;每个典型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每个“尖端事物”都具有浓厚的趣味性。加之秦牧灵活地运用了各种艺术表现手法,恰到好处地通过优美的文学语言来抒写自己的满腔热情,真正做到了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高度融合,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很好统一,所以该文才得以成为深受读者喜爱的名篇。

三

要准确、恰当地选取生活中的“尖端事物”,使之成为散文的最佳题材,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这方面,秦牧有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充分利用自己的经历,在亲身经历的事件中去获取。秦牧说过,他“经历过相当艰难困顿的生活”,因此在写作的时候,“许多年轻时代经历过的事件,一下子纷至沓来,涌进了记忆之门”[14](407页)。在《长河浪花集》中,秦牧又说道:“我所写的,都是曾经使我激动、感奋、欢乐、忿恨或思索、寻味的事情”[21](743页)。从秦牧的自叙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经历对于他的作品的选材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巍巍也有这样的感受。他说:“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22](184页)于是,他精心挑选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三个处于“尖端状态”的故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据说,杨朔也曾经经历过一件伤心的往事,所以他“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9](108页),去思念永远失去了的安琪儿。而刘白羽访问莫斯科归来,在飞机上亲眼目睹了日出奇观,于是写出了震撼读者心灵,在文坛上享有盛誉的《日出》。

在秦牧的散文中,选择个人经历中的“尖端事物”作题材的事例就更多了。他三岁随父亲到新加坡,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新加坡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秦牧在这里不仅认识了狮、豹、虎、熊、猩猩、猴、鳄鱼、兔、松鼠、斗鱼、豪猪、狼、海狗、斑马、袋

鼠、鹦鹉、大象、果蝠等奇奇怪怪的动物,而且还品尝了榴莲、山竹子、菠萝等水果的美味。这些动物、植物后来都成了秦牧散文的写作题材,可见秦牧对这段经历十分珍惜。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长大后在作品中常常喜欢谈论各种动植物,平时对生物学也很有兴趣,这和幼年时代的经历有十分密切的关系。”[20](302页)又如1944年底,在混乱的“湘桂大撤退”中,秦牧曾和夫人吴紫风从宣山步行千里,逃难到黔桂交界的六寨。一路上,秦牧饱经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混乱状况和悲惨的情景:火车三天两天开一个站,车厢顶上、车厢里面和车厢下的横梁上全都挤满了逃难者。铁轨上到处是死人,地痞流氓杀人越货。有个人被火车轧断了腿,就求别人给他一枪,免得活受罪;有个教师的小女儿死了,没有地方安葬,她最后把小尸体丢到了泥潭中……秦牧的这段非凡经历,以及其后在重庆一年多的所见所闻,后来都成了他的《白鱼·黄鱼·黑鱼》、《私刑·人市·血的赏玩》、《暴徒性质研究》、《独裁者的下场》、《运输机轶史》等数十篇散文的题材。

其次是亲自深入到生活中去体验、搜集。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革命作家应深入“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活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10](818页)。毛泽东的教导为我们指明了如何搜集写作题材的另一途径:亲自深入到生活中去体验,去获取。秦牧的许多散文题材,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得到的。他说:“我也是在实际生活中,才知道有的劳动模范,一连五年不愿休假;有个别大力士,能把四五百斤的东西挑上肩膀;有的渔民、摔跤手,一顿能够吃四五斤鱼或肉,有的牛能够长到2000斤;海南岛有的树,砍下来做电线杆,却仍能生长这一类事情的。”[2](243页)当然,作者在生活中观察、体验、搜集到的东西,不一定要都写进作品中去。但是,如果没有切身的观察、体验和搜集,“尖端事物”又从何处去挑选?事实上,秦牧前面提到的那些生活中的“尖端事物”,都分别写入了他的《江湖捉鳖人》、《赌赛》、《千斤力士》、《赞渔猎能手》、《摸鱼老手》、《巨茄》、《鹅阵》等散文之中。

再次,广泛阅读作品,在广博的间接知识中去摘

取“笋尖”和“菜心”。“笋尖”和“菜心”,是秦牧对散文中的“尖端事物”的形象比喻。一个出色的散文家,要写好散文,光靠自己的经历是不够的。况且,一个人生命有限,时间和其他诸多原因使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事必躬亲,非要到生活中去一番不可。这样,尽可能地多读作品,大量地获取间接知识,从间接知识中选择写作题材,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从前有个读书人,他对《孟子》里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一句没弄懂,便向别人请教。别人挖苦他:“尽信书是一本好书,但无书这本书比尽信书还要好!”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23]。无独有偶,当今有个英语很好的人陪同外宾去参观一家医院,医院墙上挂着一块刻有“华佗再见”四字的匾。外宾看不懂,向他询问,他翻译道:“再见吧,华佗!”结果也闹了一个大笑话[14](730页)。以上事例说明,广泛阅读作品,不断丰富知识,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对于从事写作的人更为重要。

我们知道,秦牧的“文凭”并不高,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但是,他的散文中充满了古今中外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动物植物、诗词歌赋、体育卫生等各个方面的知识,人们甚至还将“知识性”作为其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秦牧散文中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尖端事物”是从何而来的呢?还是让秦牧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像我这样一个顽皮儿童,以后没有像猪滚下斜坡一样沉沦下去,全靠书籍的挽救”。父亲“常常买些《小朋友》、《儿童世界》、外国童话之类的东西给我们看。一接触到这些东西,我常常忘乎所以,伏在地板上贪婪地阅读到深夜”。“我并非仅仅阅读童话故事一类课外书,凡是能找到,并且勉强看得懂的东西,我都如饥似渴地浏览”。秦牧这种酷爱读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他说:“文学创作需要有广泛的知识,文学创作需要丰富潇洒的语言,这方面的学识和本领,也是需要我们学到老,用到老,一辈子注意的。”他不断告诫自己:“一个写作人一般只能写到八十岁,到了那个年纪,即使还活着的话,衰弱颓废,百病交侵,要执笔也力不从心了。所以,我珍惜存下的这几年,希望多读一批好书;多写几部稍微像样的作品。自然,如果死神很快来到我的床前,那也没有什么,一个人经历过很多忧患之后,对于死,是看得很淡漠了”[20](559页)。就在秦牧把载有上述论述的《寻梦者的足印》寄赠给笔者的当年10月14日,这位

中国散文园地里的巨星便陨落了。如今读着秦牧先生的这些教诲,不禁令笔者满目潸然。但愿热爱秦牧散文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某些教益。

总的来说,秦牧散文在选材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为我们积累和总结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每一个喜欢秦牧散文的人学习借鉴,我们应该好好

珍惜之。同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我国的文艺工作者牢记邓小平的教导:“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为繁荣我国的文艺事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24](179页)。

参考文献:

- [1] 忆散文大师秦牧[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
- [2] 秦牧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 [3] 王光祖,杨荫浒. 写作[M].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
- [4]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6] 列宁. 哲学笔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 [8] 陈衡. 秦牧散文的美学追求[A]. 寻梦者的塑像[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9] 杨朔散文选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 [11]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 [13] 周立波. 散文特写选·序言[A]. 散文特写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14] 秦牧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 [15] 秦牧儿童文学全集[M].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5.
- [16] 鲁迅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8]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19] 秦牧全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0] 秦牧全集:第5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 [21] 秦牧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 [22] 中国优秀通讯选[Z].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 [23] 周培源. 自学成才要有文史知识[J]. 文史知识,1982,(5).
-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On “Typical Things” in Qin Mu’s Essay

LI Xing-kui, WEN Ming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Correct choice of subject matter is important in essay creation,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expression of the writer’s intention and the essay’s quality. Qin Mu’s essay is an example in this respect and worth our following suit.

Key words: Qin Mu essay; choice of subject matter; summing up experience

[责任编辑:唐 普]